《学术界》(月刊)
总第 148期, 2010. 9
ACADEMICS
No. 9 Sep. 2010

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化[*]
——与张隆溪教授的访谈

○梁建东[1], 张隆溪[2]
(1.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2. 香港城市大学 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 香港 九龙 999077)

〔摘 要〕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一直以来是张隆溪教授最为深切的关怀和愿望之一,他认为自己在海外求学、研究的个人经历就充分说明, 在英语已经成为西方主流学术话语的前提下, 中国的人文学者同样也有可能进入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 并在一种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与西方学者的沟通和对话。张教授进而指出这种对话对于中西方学术界双方而言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 因此, 国内学者应该以一种更加理性、积极的态度看待并投入到学术国际化的进程当中去。张教授最后还对国内外语学院的教学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善意批评。

〔关键词〕张隆溪; 当代中国学术; 国际化

梁建东(以下简称梁): 这些年自从您的丛书在大陆出版之后, 您与国内学界的交往好象才多了起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 一般读者对您的文字的记忆还停留在 80年代的《读书》上。

张隆溪(以下简称张): 确实有不少朋友都问过我: 你八十年代在《读书》上发了不少文章, 很多人都知道你, 怎么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好像突然消失了似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中美两地相距实在遥远, 来往很不方便, 回来的次数自然就少了;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所处的学术环境不同, 我必须适应美国的学术环境, 而且还不得不用英文写作。直到 98年回到香港之后, 我与国内的联系才多了起来,

---

作者简介: 梁建东(1978—), 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事比较文学与美国文学研究;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系讲座教授兼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哈佛大学文学博士, 从事比较文学、文化与翻译研究。

到今年我在香港已经住满超过了七年，不但成了香港的永久居民，而且还有了回乡证，随时都可以回大陆，非常方便，所以和国内学者的交往就多了。

梁：从您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您在出国前对西方现代的文学理论已经有了很好的理解，到了哈佛之后，在知识上有哪些新的收获？

张：我 80年代初的时候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系列介绍西方文学理论的文章，其实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国内写的，只有最后两篇是在哈佛写的。当然我在哈佛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但主要还是对一些西方原典的重新认识和学习。我对犹太文化一直有很强烈的兴趣，在国内学习英语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圣经》的重要性，但相关的书籍资料很少，到了美国之后，便利用各种机会读了不少关于《圣经》解释方面的书，既有犹太教的，也有基督教的，这些书都非常重要，也很有意思。我们要了解西方文化，就得读这些书。就像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如果只读《论语》而不读关于《论语》的各种解释，不了解这个阐释的传统是不行的，只有对从郑玄到孔颖达再到朱熹等人的经典评注都有所涉猎，才可能真正了解《论语》和儒家文化。

梁：您在国内的时候与钱锺书、朱光潜这两位先生交往密切，在美国求学的时候，应该也碰到过不少好老师吧？

张：确实如此，遗憾的是很多好老师虽然都是研究西方的大家，但对中国基本不了解，在哈佛大学没有像钱锺书先生那样学贯中西的老师，因此，也就没有一位老师曾经像钱锺书先生那样深深地影响过我。我在哈佛做学生的时候基本只上与西方文学或文化有关的课程，中国文学的课一般不上，当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已经在哈佛了，但我没有选过他的课。我曾经跟其他中国同学开玩笑说，我在国内已经跟随钱先生学了这么多年，现在到了哈佛还上中国文学的课，岂不是上了大学又上小学吗？这些话宇文可能听人传过，他对我有点不太高兴，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哈哈……。我在哈佛结识的几位好老师，像张光直、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等先生甚至还不是我这个专业的老师，史华慈教授当时应该已经退休了，我与他们真是那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美国的时候经常有来往，却从来没有正式上过他们的课。

梁：那在您选修的课程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张：有，英文系的丹尼尔·艾伦(Daniel Aron)就是非常好的一位教授，学问做得很好，课也上得好，他还是赵一凡的老师。另一位女教授叫芭芭娜·鲁瓦尔斯基(Barbara Lewalski)，她是研究弥尔顿的权威。我在国内时就非常喜欢弥尔顿的诗，所以上她的课很对我的胃口。还有一位詹姆斯·库格尔教授(James Kugel)，专门讲《圣经》，这些老师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都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有一些教授名气很大，比如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他在美国哲学界是个大名人，但我觉得他的课并不怎么样。我上过他的课，收获很大，可这收获实际上跟他本人没有什么关系。卡维尔是哲学系教授，却开了一门研究莎士比亚的课。这位老师当时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非常感兴趣，在课堂上常常用这种

方法来解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我出国之前对弗洛伊德其实一无所知, 中国人一般都不能接受把什么都归结为性的观点。后来, 卡维尔教授曾在课上指定我们要读弗洛伊德的两篇文章, 我读了以后竟然觉得非常好, 于是就到图书馆把五卷本的《弗洛伊德文集》借来从头至尾读了一遍, 还选读了他全集里的另外一些文章, 收获竟然非常大。弗洛伊德绝对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他为什么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有原因的。他本人并不像后来所谓的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者们那样教条。我在《比较文学研究入门》[1]里介绍过 Peter Brooks 的书, 就是因为那是一本把弗洛伊德讲得非常有趣的书。[2]

梁: 您去美国之后出版的第一部英文著作是《道与逻各斯》, 您曾经说过写这部书的主要动机是由于您当时不满于后现代解构理论在文学、文化中对差异的过分强调, 您为此曾经与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有过一次面对面的对话, 德里达当时除了承认自己不会中文外, 似乎并不愿意否定自己的根本立场, 为什么?

张: 这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影响非常大, 不能随便认错吧, 他毕竟是一个大哲学家嘛! 但他当时也没有办法反驳我的质疑, 所以他并不喜欢我在《道与逻各斯》中的主要观点: 中西之间的同远大于异。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很赞同我对德里达的批评, 他是研究希伯来文学的专家, 有一次去以色列开会的时候遇到了德里达。他在会上宣读的论文引用了我的文章来批评德里达。会后他打电话给我说: “德里达对我很不高兴, 但对你更不高兴。”哈哈……我想这也无所谓啦, 德里达高不高兴并不重要, 他承不承认自己的局限就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很多人到了一定阶段, 尤其是成了名人之后, 就很难接受批评。我与他对话的目的本来就不是要说服他, 而是要指出他的错误。

梁: 德里达的态度是不是代表了西方思想家在看待中国文化时的一种根深蒂固的陈见?

张: 对, 在西方尤其是在法国, 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传统, 他们很想把中国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 我在《非我的神话: 论东西方跨文化理解问题》这篇文章里讲过这一点。[3]在西方存在着这样一个传统, 总是把东方看成他们的对立面, 这就是萨义德所批评那种东方主义: 西方学者建构的东方并不是现实的东方, 而是他们想象中的东方。

梁: 我从“三联·哈佛燕京学术系列”第一辑的“编辑手记”中了解到史华慈先生当初在您与德里达的争论中是完全支持您的立场的。[4]

张: 史华慈先生确实曾公开赞同过我对德里达的批评, 其实他向来就非常关照我, 有一件小事可以在这里说一下。《道与逻各斯》是在 1992年出版的, 1994年的时候, 美国亚洲研究协会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开会, 准备颁发当年的“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 (Levenson Prize for Books in Chinese Studies), 我的这本书也获得了参选资格。这个图书奖专门颁发给在欧美出版的研究中国的学术书籍, 每届两项, 一项奖给研究现代中国的著作, 另一项给研究中国古代的著

作。古代指的是 20世纪以前,现代则是指 20世纪以后。我的《道与逻各斯》跨越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也不完全是讲中国文学,其中有不少内容还涉及到西方的人文理论和文学,这就给当时的评委们带来了一些麻烦。最初,这本书被送到了现代组,这一组的评委们看了以后觉得很好,但是这本书和 20世纪并没有很多的关系,书中提到的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古代的,所以按规则应该放到古代组去。康奈尔大学的 Edward Gunn教授当时担任了现代组的评委,他后来就曾亲口告诉我,直到"最后一刻"(at the eleventh hour),他们才决定把我的书送到古代组,可是这个时候古代组已经评出一本书来了,获奖者是位华裔女教授。史华慈先生当时正好担任这一组的评委,他在看了我这本书之后,坚持要把这个奖项给我,但其他评委认为既然已经评出了一个获奖者就不应该再推翻重来,于是史华慈先生提出要求颁两个奖,可这样做也是不行的,最后就只好给我颁了一个荣誉奖。

梁:除了专著之外,您在英语学界一些重要的人文刊物上也发表过不少有影响力的论文,我想正是因为您坚持用英文写作才得以帮助您进入了英语学界的讨论中心,比如说您的《道与逻各斯》最初就是以论文的形式在 Critical Inquiry 上发表的,[5]关于"东西方文学与宗教"的论文是在 Journal of Religion这份非常专业的刊物上发表的,[6]而关于"历史与想象"的论文则是在 Rethinking History 上发表的,[7]这样的文章还有不少而且基本上都得到了西方学者的积极反响,他们曾经发表了不少文章来与您进行直接的讨论。在我看来,您的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给西方学者提供了来自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全新视野,既直接丰富了西方学者已有的讨论内容,也促进了中西方思想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进行对话与交流,因此是非常有价值的。

张:在今天要想真正进入英语学界,就必须用英语来写作,这是不容回避的。另外,我所有的研究也只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表述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我绝不会因此就宣称自己代表了中国人,没有任何个人的观点可以代表全体,我只是尽量在讨论中表述我个人的看法而已。当然,我发表论文也不是完全没有选择,我一般都在美国纯粹的学术刊物而不是汉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汉学刊物太局限了,主要还是一些汉学家在上面发表论文。我在"文化的封闭圈"这篇论文里批评的就是美国汉学界的这种状况,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自说自话,跟外界几乎没有什么交往,这是很不好的。中国的材料、问题和观点完全可以给西方学者提供很多有益的启发或借鉴,我们也可以因此而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对话和互动,但汉学家们却往往不这样做,所以我反而不会过多地参与他们之间的讨论。

梁:谈到与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的问题,除了举办或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之外,国内学者作为个人一般不会主动与西方学者进行积极的对话,外语能力的不足制约了他们与国外同行的交流,而另一方面,一般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也几乎是一无所知,我们该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状况?

张:我们应该主动地利用各种机会向西方学者和普通读者客观地介绍中国

的文学与文化,在西方翻译出版中国学者的著作就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最近,荷兰的 Brill出版社正计划出版一套展示中国当代人文研究领域中重要的学术成果的丛书。西方出版社翻译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诗歌已经有很多了,但中国当代学者的学术著作却很少有机会获得出版,所以西方学者以前基本上不会参考中国学者的著作,尤其对我们近几十年来取得的人文学术成果几乎是忽略不计的,这种状况确实已经到了必须有所改变的时候了。Brill的这个出版计划来得非常及时,而且我也正好是这套丛书的编者之一,我的愿望是能借此把中国当代学者所取得的最好的学术成果推介到国外去,因此可以借此多做点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这套丛书中正式出版的专著已经有好几本了,第一本书是洪子诚的,第二本是陈来的,第三本是陈平原的,下面还有葛兆光和荣新江的。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的市场反响据说还不错,印了五千册。在西方,五千册的发行量已经是很大的了。

梁:以您个人的学术经验来看,在英语学界有哪些刊物对于我们比较文学研究来说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

张:像 Critical Inquiry, Poetics Toda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LN(Modern Language Not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PMLA(Proceeding of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等,这些刊物都很重要,当然还有其它刊物也不错。英国本土的刊物也有一些,只是我们接触得比较少而已。我现在正在写一篇论文,准备在英国的《跨学科科学评论》(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s)上发表。不久以前,剑桥大学的名教授 Geoffrey Lloyd写了一篇文章给这个刊物,该刊的编辑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于是就准备做一份专题,从全世界不同地方组织一批学者来讨论这篇论文,我也是受他们邀请的撰稿者之一。

梁:Geoffrey Lloyd的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张:主要是讲认知科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份刊物之所以名叫"跨学科科学评论",其宗旨就是希望打通人文与科学之间的界限,它所收录的文章虽然主要是科学方面的,但也会收录人文与社会方面的论文。

梁:如果算上您在国外用英文发表或出版的论文和著作的话,您的学术成果已经是相当丰硕的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文写作似乎并不是您的主要工作?

张:我长期都在国外,熟悉的学术圈在国外,发表的东西自然也主要是在国外了;另外,说实话,要想在国际学界形成一点影响,用中文是不行的,至少现在还不行。用英文写东西有一个起码的好处,就是能在另一平台上把我们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否则真的就只能是西方人说了算。撇开其它不谈,我们用英文写作,起码可以在西方学界发出我们的声音。瑞典皇家学院的那些评委当中,除了汉学家之外,没有人能看懂中文,但都能看英文。他们如果准备选我做院士的话,显然只能看我的英文著作,如果是中文的话,他们可能连看都不会看了。

梁:可见在某种意义上,英语其实可以帮助中国学者进入西方学界的对话

场,并把理论上的对话变成一种真正的实践,有些人认为学习英语并用英语写学术论文可能存在着文化被殖民的危险,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张:我一直主张我们应该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多与西方学者进行学术对话,这样有助于双方学术水平的发展,而用英文写作起码可以帮助我们在对话的过程中把一些不同的看法表达出来。西方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不管是德里达还是福柯、伽达默几乎都是不懂中文的,对于一般的西方学者来说,中文更是难如天书。另一方面,很多懂中文的汉学家们不仅对属于自己的西方文化往往也不怎么了解,甚至有些时候他们的一些看法还很成问题,而且又不愿与他人交流,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中国本土的学者们拿出自己的独特看法来。我的经历告诉我西方学者对于这样的对话也是很感兴趣的,所以,如果我们比以前更加主动地去做这样的工作的话,是可以改变很多东西的。

如果学习英文就是被文化殖民的话,那么中国人的最好状态是不是就要像以前那样把自己封闭起来呢?这样当然是不行的。同样,西方人学汉语,也不见得他们就会被中国文化殖民,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知识是一种力量,学习一种语言,其实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掌握一种语言就等于是开启了一片新的视域,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事实上,现在哪怕是德国学者、法国学者,他们要想获得较大的影响力,也往往得用英文写作才行,当然,用英文去写作并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情,德、法学者中英文写得好的人同样不是很多。但相对而言,英文比中文又要容易多了,很多中国人就可以写出非常漂亮的英文,而英美的一些学者也许会说中文,但要用中文来写作就困难了,西方学者中能用中文写学术论文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梁:您中学毕业后没有上过大学,但却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直接考上了北大西语系的研究生,您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坚持自学英语,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天赋看来也是不行的。

张:天赋谈不上,可能是因为我对语言比较敏感吧。我很喜欢读英文诗,读得也比较多,我一直觉得这才是学习英文的快捷方式。我当知青的时候手里只有两本英文书,一本是希腊罗马神话,一本是英国文学选读,从莎士比亚到赫胥黎的十个作家的作品选段。当时我就看这些,你想想,三年的时间只看两本书,每个字都看得很仔细。我真地是在很偶然地情况下打下了比较好的英文基础。后来我回到成都当工人的时候,也是非常偶然地遇到了一位欧阳子隽先生,他把自己的全部藏书都借给我看,他在那个时候居然保留了非常多的英文书,简直是个奇迹。我当时就按着其中一本由丹纳写的《英国文学史》的线索,把英国文学中从乔叟到19世纪的主要作家的作品几乎都仔细地看了一遍,五年的时间都在看这些,比上大学还长,后来我参加北大的研究生考试,就是靠着那几年的积累才考上的。

梁:我想您优异的英文能力除了得益于个人的刻苦努力之外,应该还与北大西语系的教育有关吧,另外,您怎样看待国内大学外语系目前的状况?

张：文革后考上北大做研究生，的确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当时的北大还有不少杰出的学者，朱光潜、李赋宁、杨周翰、赵萝蕤等教授还在西语系授课。我们读硕士三年，经过了很扎实的训练，我在北大西语系接受的系统教育确实让我受益终身。北大西语系在80年代是出了不少人才的，有人认为北大西语系的学生之所以有“后劲”，就在于他们除了语言之外，还比较注重文学、文化的学习，也就是注重对个人综合人文素质的培养。如果说北大西语系有一个传统的话，那就是给学生进行扎实的文学训练，而台大的外文系基本上接续了这个传统，你看出了多少人才，白先勇、李欧梵、余光中、王文兴、陈若曦、刘绍铭等人都是从那儿出来的，他们中一些人甚至还是从同一个班毕业的。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大部分大学的外文系现在基本上只注重听、说、读、写的训练，教出来的学生也就只能够说几句英文，没有受过多少思想文化方面的训练。学外语的学生在把外语学好的同时也能把中文学好的并不多。当然，一直以来也有很多人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但老一套的教学体制还在继续，改变起来似乎很难。

北外原来的校长郝平，现在是教育部副部长，他当初从北大的副校长调去北外的时候，就想改变北外只注重语言训练的状况，希望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于是2006年北外举办了“全国人文教育与英语教育”的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做了发言，[8]胡文仲等北外的好几位教授也做了发言，大家的想法好像很一致，所以后来北外的领导就邀请我去那做“长江讲座教授”。我同意了，可是我去了三年，发现真正的改革要实施起来实在不容易，要改也不是短期之内就可以做到的。

(本文已经由张隆溪先生审定)

注释：

〔1〕〔3〕张隆溪：《比较文学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2〕Peter Brooks, 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 New York: Vintage, 1985.

〔4〕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哈佛燕京学术系列，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13页。

〔5〕Zhang, Longxi. 1985. The Tao and the Logos: Notes on Derrida's Critique of Logocentrism. Critical Inquiry 11 (3): 385—398.

〔6〕Zhang, Longxi. 2009. Comparative Journeys: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East and West. Journal of Religion 89 (4): 627—628

〔7〕Zhang, Longxi. 2004. History and Fictionality: Insights and Limitations of a Literary Perspective. Rethinking History 8 (3): 387—402

〔8〕张隆溪，“Teaching English in China: Language, Literature, Culture, and Social Implications”，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9月，第5期。

〔责任编辑：黎　虹〕